

閱讀安東·貝曼的 《邁向翻譯批評理論之路》

卓加真

書名：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: John Donne

作者：Antoine Berman

譯者：Françoise Massardier-Kenne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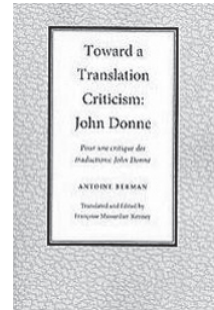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：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

出版年：2009

總頁數：249

ISBN：978-1-60635-009-6

售價：美金28.59元



法國翻譯研究學者安東·貝曼 (Antoine Berman, 1942-1991)，對西方翻譯研究的影響甚鉅。國內讀者較熟悉的是貝曼《異的考驗》(*L'épreuve de l'étranger*, 1984) 一書，這是貝曼作品中第一本譯成英文的書 (1992年)，貝曼的學生韋努蒂 (L. Venuti) 也將該書的節錄內容，收錄於其翻譯理論讀本中，因而此書較廣為人知。然而，貝曼最主要的貢獻，可能是他對於翻譯批評的理論建構。

《邁向翻譯批評理論之路》(*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*) 這本書，是二十五年前貝曼在重病之下完成的論文。在生命的最後三個月間，他把握分分秒秒，醫院的病床上，除了藥物和醫療設備之外，還堆滿了書籍、論文，在這樣的狀況下，貝曼完成他對翻譯批評的理論建構。貝曼的妻子伊莎貝爾 (Isabelle Berman) 在序言中回憶這段日子，她說，每次貝曼一有新的進度，便將內容唸給來探病的朋友聽，「貝曼經常唸出書

中首章的內容……我們也聽著，沉醉在書寫的聲音和文字的永恆中。這些文字摧毀病房的重重屏障。詩人永不凋零 (The poet is never sick) (p. xix)。該書譯者Massardier-Kenney教授稱這是貝曼的最後一篇論文，卻也是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 (p. vii)。可惜的是，一直到2009年才出現英譯本。不諳法文的讀者，終於能一窺貝曼的翻譯批評理論。

時至今日，儘管市面上的出版書籍以翻譯書為大宗，多數的書評家仍對「翻譯」這個活動視而不見，而只談原作者的思想內容，對於譯者達成什麼，或未能達成什麼，無法客觀的分析與評論。誠如本書譯者所言，現在該是我們為翻譯經驗建構一套理論的時候了 (p. vii)。書中，貝曼具體說明翻譯批評時應注意的事項與應遵循的步驟，對於有志從事翻譯批評的讀者而言，不啻是一本值得參考的手冊、指南。

在學術理論的地圖上，貝曼受到班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的影響，因此，他也希望能夠發現譯作本身的真理 (truth of a translation) (p. 3)。另一方面，詮釋學學者高德美 (Gadamer) 的理論，讓貝曼毅然放棄傳統的「忠實」觀。貝曼最大的心願，是將譯作視為具有文學性的整體。他絕口不談「忠實」(fidelity)，而是希望將學術焦點放在「譯者的計畫」(translator's project) 上。這個論點受到加拿大女性主義翻譯批評理論家的重視，也將貝曼的理論，應用在翻譯的女性主義議題上。在貝曼眼中，譯者是譯作的「作者」，亦即他所稱的「翻譯主體」(translating subject)，是他主要的研究對象。他要像心理分析師一樣，對譯作加以詮釋，進而分析譯者。

讀者可以發現，這是一本理論與應用並重的書。貝曼先是建立起翻譯研究的理論架構，接著以實例應用其理論。整本書分為三大部分，第一部分著重在理論的建構，強調如何書寫有建設性的翻譯批評。在第二部分，貝曼以英國玄學派詩人鄧恩 (John Donne) 詩作在法國的翻譯狀況為例，讓讀者看到精彩的理論應用，是篇幅最長的一部分。第三部分貝曼探討鄧恩的譯作在法語文化中的接受狀況，可視為是第二部分的延伸。

貝曼從文學批評切入。現代文學批評始於德國詩人學者施萊格爾(Friedrich Schlegel)，其傳統已久，但翻譯批評卻一直處於邊緣、不受重視。貝曼參考施萊格爾的批評觀念，期許翻譯批評家也能像文學評論家一樣，創造出有建設性的批評(productive criticism)。貝曼引用這位德國學者的話說道：「批評不僅僅是對過去、既有文本的評論，更重要的是，要為將來、尚未成型的文學，提出一套思考方法」(p. 78)。如果譯作品質不盡理想，那麼翻譯批評必須能提出未來譯本所應遵循的原則，並為將來譯本預備空間，等待新譯本出現。如果評論的譯作是成功的作品，那麼翻譯批評家要能夠表現譯者的創意與巧思。

接著，貝曼澄清一般人對於翻譯批評的誤解。在〈譯者的天職〉一文中，班雅明認為有些原作會召喚人們為其翻譯，然而，所有譯作卻都召喚人們的評斷(judge)。這自然是受到傳統上認為翻譯總是有缺陷的、次等的影響。這是譯作永遠要背負的原罪，就因為它不是原作(p. 29)。貝曼認為，翻譯批評的目的，並不是要「消滅壞譯本」，而是要發現壞譯本之所以失敗的原因(p. 25)。對於優秀的譯文，翻譯批評則要像面鏡子一樣，反射出譯作的優點，並使之永恆。貝曼受班雅明影響，認為批評和翻譯一樣，都是文學作品的後續生命(afterlife)。貝曼進而申論批評與譯文之間的緊密關係。譯者本身就是個評論家，若譯者參考之前的譯作版本，而產生新譯本時，更是難免對先前譯本品頭論足一番。對於譯作的功能，貝曼巧妙的使用一個比喻，他認為譯作就像照片，能夠捕捉譯作產生當時的時空、文化、語言背景(p. 28)。

接著，貝曼開始提出他的翻譯批評步驟與方法。一開始，我們必須要有耐心的看完譯作，一遍可能不夠，最好能多看幾遍(每次的目的不同)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須忍住想翻看原文的衝動，完全將原文放在一邊，避免「比較」原作與譯作。第一遍閱讀時，我們心中想著，這是一本以本國語寫成的外國作品，第二遍閱讀時，將作品視為譯文，並轉換角度閱讀譯文。根據貝曼的看法，這樣的翻譯閱讀習慣，與我們天生的

閱讀習慣不同，是需要培養的。這樣的譯作閱讀方式，有助於我們判斷譯作是否符合目的語文化的書寫標準，進而發覺譯作本身的「內在一致性」(immanent consistency)。透過這樣的閱讀，我們要注意譯文中是否有不協調或是不流暢的譯文，用字遣詞是否恰當，是否受到原文的汙染，而出現不符合目的語語法的字句。再次閱讀譯文時，我們要注意譯文中是否有「翻譯書寫」(writing of translation)，亦即譯者以目的語言書寫外國文本，進而創造出更優雅、更豐富的目的語文本 (p. 50-51)。

對譯文有了大致的印象之後，接著才開始閱讀原文。同樣的，在閱讀原文時，也要將譯文放在一邊不看。閱讀原文的目的是為了發掘原文的風格特色，例如：句子的種類、轉折詞的使用、用字遣詞等等，並且看出作者使用文字的偏好與節奏。在此，貝曼特別提出「閱讀」對於翻譯批評家的重要性，他/她不只要閱讀原作者的其他作品，也要閱讀與該作者相關的各種研究。接著，批評家要耐心的選擇相關的段落，這些段落必須能夠突顯出原文與譯文中，重要的風格衝突點。

貝曼認為，要瞭解譯文的邏輯，必須從譯者下手。當我們問「譯者是誰？」的時候，我們想知道的是與譯者語言能力相關的所有資訊。譯者是專職從事翻譯，還是另有其他職業（如教授或作家）？他/她通常翻譯何類作品？譯者是否曾寫過相關的翻譯研究論文？有沒有留下任何關於翻譯的言論？這些對於貝曼來說，還不夠，批評家應該進而探討譯者的翻譯立場 (Translating Position)、翻譯計畫 (Translating Project)、與翻譯視域 (Translating Horizon)。

所謂翻譯立場，主要是指譯者對於翻譯活動的看法。譯者如何看待他自己所進行的翻譯活動，他對於翻譯的目的、意義、形式的看法為何？當然，譯者的看法有可能受到當時社會、文化的影響。這裡的立場，可以是譯者經過不斷掙扎和對立，與當時翻譯氛圍妥協的結果。很少有譯者會主動表達他們的翻譯立場。貝曼認為，譯者的立場最能在其譯作中顯現 (p. 58-59)。所謂翻譯計畫，則是與譯文的外觀呈現有

關，譯文是雙語對照版本，還是單語版本，是否有導讀、前言等類文本 (paratext) 出現。總而言之，就是譯者希望讀者看到怎麼樣的一本翻譯書 (p. 59-62)。所謂翻譯視域，是指譯文出現當時的語言、文學、文化與歷史背景。貝曼受到詮釋學的影響，認為譯者所處的視域所在，也會影響譯者的思考與行為。視域可以讓我們了解譯者翻譯策略背後的理由，同時也可以讓我們看到譯者的侷限 (p. 62-66)。

在詳細說明完理論的建構部分之後，接著是貝曼的個案應用。他選了英國詩人鄧恩 (John Donne) 的 “Going to Bed” 一詩，討論 Yves Denis (與 Fuzier 合譯，以下稱 F and D 譯本)、Philippe de Rothschild、Auguste Morel 與 帕斯 (Octavio Paz) 等法文與西班牙文譯本 (貝曼自己也翻譯拉丁美洲小說)。貝曼著墨且批評最多的，是 1962 年由 Jean Fuzier 與 Yves Denis 出版的雙語版詩集 *Poèmes de John Donne*。貝曼認為在這些譯文中，Octavio Paz 的翻譯最佳，而最糟、卻也流傳最廣的是 F and D 的雙語譯本，他們的譯文令貝曼感到「震驚」與「失望」(p. 90)。

在法國，英國詩人布萊克 (William Blake) 與霍普金斯 (Gerard Hopkins) 的法文譯本盛行，鄧恩的譯本卻是寥寥無幾、無人聞問，經常是譯者譯好書之後，出版社便倒閉而終未能出書。貝曼注意到，鄧恩的名字常被學者提及，但他的詩集卻沒有受到同樣歡迎。然而，正是這樣的一個現象，吸引貝曼思考整個翻譯批評的議題。貝曼敘述自己與帕斯西班牙文譯本邂逅的經驗，詫異於帕斯筆下的鄧恩令人著迷，怎麼譯成法文之後，竟變得如此難以親近。

主要原因是 Fuzier 與 Denis 這兩位譯者，主張以法文傳統語體翻譯鄧恩的詩作，原本在鄧恩詩裡 (與帕斯譯文中) 所展現出的簡明風格與抒情詩韻，在譯文中，卻因為所採用的古體語言，讓人看而卻步。相對之下，帕斯採取意譯 (free translation) 的策略翻譯，卻精彩的呈現出原詩的意涵。

在震驚與失望之餘，讓貝曼更感興趣的，是這個翻譯版本背後所隱

含的價值體系 (system)。他相信每個現象背後，都有一個造成該現象的系統支持著，究竟是怎麼樣的系統，竟然不願傳播鄧恩的詩作，而是讓他的作品變得如此遙遠與晦澀，只有骨董家才感興趣呢 (p. 91)? 為了探尋這個系統，貝曼依照自己先前提出的批評理論與方法，為讀者展示其理論的應用。

貝曼特別聚焦在譯者身上，他認為譯者心中對自己所要呈現的詩人鄧恩已經有個譜，這是「譯者的自由」(translator's freedom, 頁34)。大多數有經驗的譯者讀到這裡，才會驚覺原來自己也跟詩人一樣，擁有某種自由 (poetic license)。貝曼肯定Fuzier與Denis兩人以雙語對照方式出版詩集，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是符合譯者的職業道德 (ethics)，因為兩人敢於展現自己的作品。然而，兩人卻錯誤地將“Going to Bed”這首詩想像、進而翻譯成法國文學傳統中的情色詩 (erotic poetry)，因而導致整個翻譯風格的大錯誤。貝曼分析整首詩的結構與邏輯，引用William Blake與Novalis的詩，論證詩中的「裸體」(nudity)，在上帝眼中看來是美好、神聖的。因此，貝曼合理的主張這首詩想表達的是夫妻之間的愛，而詩中的「裸體」是宗教上的自我追尋與自我呈現 (p. 120-132)。鄧恩描寫的並不是「性慾」，譯者也不需將詩中所有的字眼，都做相關的聯想。接著，貝曼深入探討鄧恩的用字系統，whole、full、all這類平凡的字眼，對鄧恩來說卻是意義不凡。由於譯者對鄧恩不甚了解，在他們筆下，full譯為total，但total（讓人聯想到數量）卻無法表達詩人對於「完滿」的意涵。鄧恩對於否定字眼（如：unbodied、uncloth'd、unpin、unlace）的使用，除了直指自我之外，還帶來了特別的詩歌效果 (poeticity)。貝曼認為翻譯鄧恩的譯者，沒有了解到這些重要的差異，常常批評他們兩人是「思慮不周」的譯者。

在鄧恩的詩歌翻譯上，貝曼認為只有墨西哥詩人帕斯的譯文最理想。他不厭其煩的長篇引用帕斯的理論，為的就是要表達「翻譯即是再創作」的觀念。若只是一味固執的想要忠於原文，便是犯了大忌，因為

每個時代，每個地方的語言特性不同，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樣、可完全對應的說法。帕斯並非隱身的譯者，他開宗明義的說自己的作品並不是翻譯，而是改寫。貝曼也承認，帕斯的改寫程度不小，透過抽離 (spacing; espace)、濃縮 (compacting) 與簡化 (simplifying) 的方式，帕斯時而加入原詩沒有的元素，時而避免原詩的冗長而刪去某些字句，時而簡化原詩的複雜觀念。這些做法卻成功的讓譯詩擺脫原文的古體結構，同時也掌握住原詩的精華與中心思想 (essence; core)。相對的，Fuzier與Denis的譯文雖然保留了原詩的結構，卻無法展現其精髓。

除了文本之外，貝曼也探討接受（或不接受）鄧恩譯詩的社會背景。某個翻譯作品進入到一個社會，究竟產生怎麼樣的反應，也是貝曼非常感興趣的。他探討Fuzier與Denis譯文在1962年出版時，受到怎麼樣的注意。他很驚訝的發現，當時幾乎所有譯評，都稱讚兩人的譯文，儘管此譯文錯誤百出，出版評論卻還是正面的。深入檢討原因，貝曼認為當時的評論家，沒有人將Fuzier與Denis的譯文，視為一個翻譯計畫來檢討，而是迷失在譯者的其他光環之中。這引起貝曼的興趣，他問道：「究竟是怎麼樣的視域之下，社會竟能將這樣糟糕的翻譯，視為是優美而忠實的譯文」(p. 210)? 為此，貝曼從翻譯視域與詩學視域兩方面，來檢討兩人的翻譯計畫。為了完整呈現當時的視域，貝曼詳述在那段時間曾經出版過那些翻譯理論，也澄清當時的翻譯理論代表，應是Valery Larbaud，而非George Mounin。

從貝曼的翻譯評論分析來看，我們終於發現何以在翻譯書充斥的市場上，仍然難見翻譯評論文章。因為翻譯評論家必須比一般的評論家多一道步驟：閱讀原文，而譯作與原文的分析比較，其實並不容易，其工程之浩大，也難以在短篇評論的篇幅中論述清楚。然而，儘管翻譯批評的面向繁多，貝曼在此書中詳列的許多細節，卻為我們指出更多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翻譯現象。從原文與譯文不同的閱讀習慣，到翻譯如何像照相機一般捕捉住年代的風貌，這些議題都值得感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探討。

